大渡河战役：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

□ 张德勤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也是人民军队战史上一场生死存亡的作战。此役主要包括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战斗两个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又一关键之战。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彻底粉碎蒋介石企图凭借大渡河消灭中央红军的目的，红军先遣队于24日突然袭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歼敌2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南岸渡口。次日，由红1团第2连17人组成的突击队强攻占领了北岸渡口，打垮了敌人的反扑。但由于追敌逼近，缺乏渡河工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领导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保证大军渡江。29日下午4时，由红4团22名官兵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弹雨，攀着13条铁链，冲过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后续部队立即渡河攻克泸定城，歼灭守敌一个团。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战役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

以史为鉴，精心准备

强渡江河作战始终是陆军面临的一大难题。进攻方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河流的水文、地质等情况特别是渡河点以及敌军设防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方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被天险大渡河挡住去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统领大军在大渡河边，就是因为对背水作战、渡水作战的特殊性认识不清、准备不足，被清军围歼于安顺场地区。蒋介石见中央红军走进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狂妄叫嚣着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其实，和72年前的石达开相比，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要严峻得多。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并制定了把中央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对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毛泽东同样清楚。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了著名的铁厂会议，就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线做了周密部署。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中央红军过彝区时恪守民族平等政策，并深入当地老百姓家中进行耐心访查，赢得当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为抢渡大渡河做好了先期准备。原国民党24军参谋长张伯言回忆：“当时拾得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村落居民，注解非常详细，好似战前专人勘察一样。”红军情报全面准确，与人民鱼水情深，牢牢把握住了战略主动，战略部署思虑深远，战术执行雷霆万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战争的历史是后来者研究战争、审视战争、把握战争的不竭财富，我们只有注重加强研读战史战例，才能以史为鉴、知史明智。

审时度势，临机决策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情总是在起变化，周全的方案有时也难免要临机调整。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确实是险之又险。大渡河水势凶猛，河宽约300米，河中心水深30米，水流异常湍急，自古就是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国民党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在大渡河上下游严密布防，并将船只、粮食等物资统统搜走。红军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大部队渡河缺乏工具，共有3只木船（缴获的1只、在渡口下游找到2只），最多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如果只靠3只木船来渡河，不知要多少时日，而架桥在时间和条件上也都不允许，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于5月26日中午赶到安顺场，在仔细了解了情况后，审时度势，果断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红1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左岸前进；红1军团部、2师主力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

当今时代，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赢得战争就更要在应变中适应战争，切实做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预案，并在军事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特别是在战场情况发生突变巨变时，指挥员要快速反应、冷静处理，准确分析判断情况、及时调整作战方案，做好临机决策，以决策优势赢得战场主动。

兵贵神速，灵活机动

中国古代兵家讲，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兵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恩格斯也曾指出“时间就是军队”。计划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中革军委果断地决定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利用敌人的错误估计，把敌军兵力较弱的安顺场作为强渡大渡河的突破口；同时另派一支小部队伪装主力红军，走宁雅大道前往大树堡，大造声势，以吸引和迷惑富林之敌，掩护主力红军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面对渡船太少的实际，决定分两路北上泸定桥。敌军也急调兵力开往泸定桥。谁先一步到，谁就夺得先机。中央红军迅速作出反应：提前一天夺桥！命令由“十万火急”变成“万万火急”。28日，在红4团向泸定桥急行军的时候，对岸川军也在向泸定桥增援，红4团几乎是在与敌人隔河赛跑。雨夜行军，突然对岸增援的敌军点燃了火把，红4团领导灵机一动，决定也点起火把，让敌人误以为是他们的同伙。后来，对岸敌人累得不行，只好宿营了，红4团还在拼命往前赶。一昼夜，红4团边打边走急行军240里！终于29日清晨赶在敌人前面到了泸定桥。

兵贵神速，就是要以快制胜，最难得的是时间，最易失的是战机。现代战争首战即决战，发现即摧毁，这就要求我们未来作战要精准计算时间、运用时间、争取时间，切实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快速打击能力。

信念坚定，英勇顽强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大渡河战役，红军广大官兵凭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发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激流里勇进、险路上飙行、铁索间强攻，与困难斗争、与时间赛跑、与敌人战斗。

红4团急行军240里，创下了一昼夜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纪录；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地77名船工“人歇船不歇”连续摆渡7天7夜，为夺取泸定桥赢得宝贵的时间；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面对弹雨，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夺取了大桥，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神炮手”赵章成在17名勇士前进受阻的情况下，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4发4中，压制了敌人火力，为强渡大渡河立下了汗马功劳。

聂荣臻曾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红军不仅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这是坚定信念支撑下精神抖擞的进军。今天，我们的物质保障相较以往有了巨大提升，但是我们的顽强意志、必胜信念不能丢，这样我们不但能在“顺境”中所向披靡，更能在“逆境”中出奇制胜。

（摘自2019年9月10日《解放军报》）

朱德：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 张树军

1958年7月，朱德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上有一副对联，上联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联为“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指出：“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朱德所说“下去”，就是调查研究，他不仅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还具有鲜明的调研特点，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朱德认为，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就是深入基层弄清情况，再作决定。早年朱德带兵打仗时，每次战前“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他说：“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后来到德国寻求革命真理时，朱德“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到苏联后，朱德继续坚持调查研究，常常深入农村和基层，跑了不少地方。朱德说：“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

朱德认为，调查研究要有重点，就是要有的放矢，找准问题。抗战中期，朱德经常到陕甘宁边区各地调查研究工、农、商各行业情况。朱德根据对边区粮食问题的调研，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多次亲赴南泥湾调研和指导工作，从此，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

朱德认为，调查研究要呈现方法的多样性，就是要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具体而言：一是看材料。朱德外出视察前，常常找来所去地区的有关材料阅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听汇报。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认真而详细地听取当地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汇报。1954年3月4日至31日，朱德在广东视察期间，他先后听取了中共华南分局工业部部长杨一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等十几人汇报相关情况。三是召开座谈会。朱德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他通过召开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方式，聆听干部和群众意见。朱德鼓励大家讲真话：“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四是亲临现场。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他视察内蒙古白云鄂博时，就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五是派工作人员下去调研。朱德叮嘱他们：“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

（摘自2019年4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晓天下

马玉清：父子传承一门双烈

□ 齐泓鑫

马玉清，1946年出生，中共党员，1965年12月应征入伍。

1974年12月20日凌晨，哈尔滨市第五制粉厂突发火灾。当马玉清他们赶到火场时，已是火光冲天，浓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作为现场指挥员的马玉清心里十分清楚，爆炸起火的车间厂房主体高，楼上没有任何门窗，想在更大的爆炸前稀释粉尘灭火，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到17米高的车间顶部。他果断下达战斗指令，命令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勇敢率先冲在前面。马玉清知道，如果不截住火势的蔓延，势必造成企业高压锅炉和贮存3000多斤机油的油库爆炸，酿成更大的灾祸，同时严重威胁毗连的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哈尔滨针织二厂等国有企业和附近数百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马玉清判断可能会有危险，独自拽过水枪，命令其他战士一律撤到地面，自己准备进入火海。班长刘玉印一把拉住马玉清：“队长，危险，让我上。”马玉清用力把刘玉印推了出去，大声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告诉你嫂子，千万把孩子带好。”说完，马玉清手持水枪冲进火海，刘玉印和几位战士也跟了上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把车间五楼的楼顶炸得粉碎。马玉清和他的战友为后援的消防部队赢得了灭火的时间，他们的牺牲保住了企业的高压锅炉和油库，保住了周边的安全。

哈尔滨市公安局对在此次消防战斗中牺牲的战士进行了表彰，并为马玉清追记二等功一次。1975年3月25日，中共哈尔滨市公安局核心小组授予马玉清模范共产党员称号。1975年11月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马玉清为革命烈士。

1988年，马玉清的大儿子马忠学参军入伍，继承父亲的遗志。他坚决要求到战斗一线，在消防队中，积极参加训练，连续两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993年3月29日凌晨3时，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地区汽车修配厂发生大火。马忠学接到警报后立刻赶赴现场，这是他所经历的第121次灭火战斗。到达现场后，马忠学主动请缨到位于下风方向的油库附近，直接堵截火势。夜幕之中，一辆大货车突然超速驶来，马忠学被货车撞倒，牺牲在血泊中。

19年前，父亲马玉清在火场上英勇地倒下，牺牲时年仅28岁；19年后，儿子马忠学也在火场上英勇地倒下，牺牲时年仅23岁。

（摘自201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令”

□ 胡遵远

金寨籍老红军“两膺上将”第一人、“六星上将”洪学智曾两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他经常告诫自己和下属：“人生一世，可能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以宽容之心待人、敬业之心做事、敬畏之心律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贪图小利。”

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洪学智定下了许多规矩。后来，这些规矩被概括归纳为“八条铁令”，始终认真执行：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下部队吃饭必须交钱，账不结清不走；下部队就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

洪学智带头执行廉政规定，精心为国家和军队理财，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有诗赞道：两授上将垂青史，一代风范励后人。

必须从细微之处做起，从严做起

洪学智经常到部队、到地方去开展调查研究，遇到部队与地方领导送礼，他一概拒收。有一次，洪学智下部队，在乘车返回的途中，发现车上多了一布袋花生，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特意从地里挖了点送的。洪学智听了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吃住都在部队，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走了还拿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洪学智还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一点东西、占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如果部队的风气坏了，还怎么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以后，洪学智还多次拿这件事教育大家严守他的“铁令”。

一次，洪学智到内蒙古视察，当地领导安排参观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厂领导准备了几件羊绒衫，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转给洪学智，希望能够帮助扩大宣传。政协主席征求洪学智随行人员邢秘书的意见，邢秘书说，首长不会收的，您还是别去碰他的规矩。政协主席坚持道：“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产品，是请首长帮助扩大宣传的，我直接去跟他解释。”最终，羊绒衫还是被悉数退回了。事后，政协主席感慨地对邢秘书说：“还是你对老首长了解深，虽然礼物被拒绝了，可我这心里却更加敬重他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质的确让人钦佩！”

在洪学智身边工作了24年的邢秘书，对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律”只有一次动过“破例”的念头。那一次，他陪同洪学智到安徽芜湖调研，当地政府的同志送给首长一个砚台，邢秘书觉得这个东西对首长练习书法、健身有用，就自作主张收下了。结果报告洪学智后，还是挨了一顿批评。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收了第一次，就会收第二次，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这些看似小事，许多人犯错误都是从这些看似点滴小事开始的，所以必须从细微之处做起、从严做起。”最后还是按他的意见退了回去。

洪学智不收礼也不送礼。有一年春节前夕，工作人员善意提醒他，“您是不是也适当地给领导同志拜拜年？”他摇摇头，说：“首长们那么忙，有事在工作时间里就汇报了，没有必要节假日期间再去打扰，人家也需要过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节日，我们不要去搞那些庸俗添乱的东西。”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逢年过节，他一定会去探望老帅或老帅的遗孀们，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洪学智动情地说过：“老帅们为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洪学智每次到部队检查工作，都是到食堂与干部、战士一起用餐，并主动结算费用。一次，天山之行，车队出发已经大半天了，洪学智忽然得知还没有交伙食费，勃然大怒。返回去补交已经不行了，无奈只好猛批秘书。随行的领导想解释几句，不料越解释，洪学智越火。他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党的要求讲到个人操守，摆事实、讲道理，滔滔不绝，整整讲了三四个小时。从那以后，随行人员总要互相告诫、彼此提醒：吃饭千万不要忘了交费，而且一定手里捏着凭据才敢离开。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兰州出差，回京前的晚上，催促秘书赶紧把账结了。秘书去结账时，对方办事人员恰巧不在，他见时间已晚，觉得第二天一早结账也来得及，当晚也就没有办。谁想第二天清晨，洪学智一见到秘书，第一句话就问结账的事，听说还没结，立即发起火来：“什么找不到人，快去把账结了，否则我们不能走！”直到秘书结完账并把发票呈给他审阅后，他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洪学智下部队，坚持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招待用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规定，不准突破、不准搞变通。有一次，他到总后的一个直属单位去调研。第一天晚餐，按正常速度上菜，两道菜之间相隔时间比较长。洪学智吃过四道菜后，说吃饱了，起身便走。单位领导明知菜还没有上完，也不便明说，只好陪同离席。第二天晚餐，上菜速度加快了，不等洪学智吃饱饭，已经上了六七道菜。洪学智问，昨天上四个菜不是很好嘛，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增加？到了第三天晚餐，虽然还是四道菜，但每道菜都换成大盘子，一个大盘子中放了好几样菜，成了大拼盘。洪学智问，你们还有比这更大的盘子吗？单位领导开始说有，但很快琢磨出这是变相的批评，便连声说没有了、没有了。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想让我吃好点、多吃点，是一片好心，但菜多了，一是破坏了规矩，二是造成浪费，三是可能有害健康，何苦呢？随着物资的丰富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人劝他不要太较真，可以变通一下。洪学智则说，不管物资多么丰富，社会风气怎么变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洪学智平常迎送客人，都是自掏腰包，设家宴招待。一次，洪学智率团赴美访问，临行前把外交部领导请来商量访问的事宜，总后领导建议公款招待一餐，洪学智硬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在家里设便宴。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会客室放下一张圆桌后，师傅送菜都进不来，只好请客人代劳。

2000年，《洪学智回忆录》出版，作为晚年的一件大事，洪学智很高兴，设宴招待编辑人员。他谢绝了各种建议，不去宾馆饭店，也不去内部招待所，坚持在家里宴请客人。虽然没有名贵的菜肴，却充满感人至深的真诚与热情。这一顿饭，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深深的思考。

（摘自2018年第6期《党史纵横》）

忆往事